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

李 隆 基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统一组成。正面战场是中国军队为保卫国土正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阵地。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极关重要的内容。过去抗日战争史研究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很低。近十年来逐步开始改变这种情况，正面战场成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本文拟对正面战场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战场形势的演变成为全国上下时刻关注的中心。当时，政府当局发出许多指导战争的文电，各层次的作战单位写了大量的战役、战斗报告和总结；新闻界及时作出详细报道，发表对战局的评论；研究者发表了很多论文和著作。这些战争期间积累的资料，数量巨大，价值很高。作为档案留存的，现在有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等，以及各地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论著方面，据有关方面统计，论文在千篇以上；书籍、小册子及军事报告等约700种左右，其中包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历次军事会议上的讲话，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五届五次至十二次中央全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几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和他写的《三年来之抗战经过》、《四年来的战事经过》、《五年来之抗战经过》等；还有

参谋长会议要录、重要战役著述等等。^①

抗战胜利后，陆续出版了一些抗战史的专著，主要有：《八年抗战之经过》（何应钦著1946年出版）、《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陈诚著1946年出版）、《抗战八年军事概况》（白崇禧著1946年出版）。曹聚仁、舒宗侨编著、联合画报社194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画史》很有特色，不仅用大量篇幅记述了正面战场作战的经过，还刊载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此外，还出版了重要史料《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下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1945年、1946年出版）。

所有这些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档案及各种著述，尽管在立场、观点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史实方面也有不确切之处，但在如下几方面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一）军事当局的抗战方针，战略战术；（二）军事组织情况，如最高统帅部组织、战区划分、军队部署、部队状况、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兵役制度等；（三）各次战役和重要战斗详情；（四）敌情研究；（五）各项重要统计数字，如军费开支、军粮供应、兵员补充及武器弹药消耗数量等；（六）军政、军民关系；（七）受降经过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正面战场不可缺少的资料，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实行全面抗战，对正面战场作战也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对正面战场曾作过许多评论，对国民政府制定作战方针，起了积极作用。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对正面战场也作了及时报道和评论。1940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摘编了大量有关正面战场的资料。这些也是研究正面战场的重要参考资料。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加剧反共磨擦，中共方面曾着重批判他们这种危害抗战的行为，现在研究这段历史

^① 参见周元正编：《抗日战争史参考资料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上册，中华书局版。

时，则应注意进行全面的分析。

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抗日战争史研究集中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发表的约280多篇论文和近30本著作和小册子中，没有对正面战场研究的论著。有关文章和中共党史、革命史等著作中，论及正面战场时，都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有关国民党对日作战态度和对国民党战场的论断，简单地提到武汉失陷以前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然后着重批判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一连串大溃败，丢失大片国土，使亿万同胞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对正面战场局势的演变，国民政府军队作战的实际情况未作全面的叙述和评价，给人造成正面战场只是消极应战，并且是一败涂地，罪责累累的印象。到文化大革命前后，甚至连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的事实也不提及了。但是，应该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于1958年编选了一套《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其中第二、第三辑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档案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发表了由原国民政府军政官员撰写的30多篇文章，回忆了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忻口战役、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中国远征军的战斗经历。各省、市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也发表了许多这类回忆文章。此外，1953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57年北京五院校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翻印了《抗战中的中国军事》，商务印书馆1959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和井上清的《日本的军国主义》，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不过当时并没有利用这些资料开展对正面战场的研究。

总起来看，建国以后正面战场的研究并未开展，也就不可能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取得进展。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人们对这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问题不敢涉足。正面战场实际上成为抗日

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反对思想僵化。这一方针给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十年来，尤其是1985年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介绍了台湾的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日本等国的一些论著。先后出版的论著有：龚古今等主编的《抗日战争史稿》，何理的《抗日战争史》，罗焕章等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马仲廉的《抗日战争史话》、《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胡德坤的《七七事变》，袁旭等的《等二次中日战争纪事》，《张治中回忆录》，梁敬𬭚的《史迪威事件》，《白崇禧回忆录》等。王桧林、黄元起、魏宏运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等，对抗日战争也作了新的叙述。翻译出版的外国著作有：《日本外交史》、《大东亚战争全史》、《华北治安战》，《日本近现代史》、《日本侵华内幕》、《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本天皇的阴谋》、《今井武夫回忆录》、《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在华使命》等。十年间出版的专著、译著及有关著作约400种，发表的论文、回忆录等约2000篇左右。

近十年来正面战场研究也取得重大成绩，先后出版的专著有：郭雄等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毛磊等的《武汉抗战史要》，张宏志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等。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翻译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长沙作战》、《香港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昭和十七、八年（1942

1943)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编的《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等。《民国档案》先后发表了《有关忻口战役作战指示和各部队战报选》、《广济战役前武汉会战战况资料选》、《南京国民政府大本营关于全面抗战作战指导方案等训令四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卅次会议记录》、《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和(乙案)等档案史料。《历史档案》先后发表了《中国驻印军反攻侵缅日军作战经过史料》、《宜昌战役档案史料选》等档案史料。回忆录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编审组编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人民政协报》编的《华夏壮歌》等。十年来发表的专题研究或有关正面战场的论文约有200篇。此外，1985年在全国和各省市分别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许多研究正面战场的论文，正面战场成为各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显然，抗战中的正面战场研究已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

十年来，在正面战场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见解，并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第一、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或是避而不谈，或是认为国民政府对抗日未做任何准备，只是被迫仓促应战。1985年2月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较早提出国民政府准备抗

日的事实。1936年2月，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他建立了秘密领导机关，在淞沪地区进行实地侦察，构筑据点工事，部署军队，并向最高当局提出“先发制敌”的作战设想，使淞沪会战开始后的进攻战得以实行。后来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述或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其中乐嘉庆等的《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一文，对此作了全面的述评；陈谦平的《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则专门就国防准备方面作了论述。乐嘉庆等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准备抗日的问题，但大多停留在计划上、口头上，只是到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侵略已经威胁到国民党政权自身的稳固，才“不得不逐步把抗日准备从口头的幌子变成了初步的行动”。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经济准备包括财政、工业、交通、水利等建设，对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军事准备包括统一军队编制、充实军备、建设特种部队、构筑大量防御工事、修整江海防要塞、实行国民军训、加强防空等，这是“南京政府抗日准备中的最主要部分”，是其对日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①陈谦平详细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国防区域的划分、国防工事的构筑和江海防要塞的整建情况，指出：1934年蒋介石将全国划分为10个国防区；1936年春季前后，全面展开修筑国防工事，至七七事变前，江浙、山东、河南、晋绥、冀察各区第一期工事基本完成；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虎门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这些国防建设，“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但是，由于“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略等因素的影响，整个建设可说是“计划周密，进展缓慢，魄力有限，功效甚微”。^②此外，《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

^① 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

^② 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1987年第1期。

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乙案)的发表，也使人们对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要领和军事部署等情况有所了解。①

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进行探讨，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继续深入研究，对全面估计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状况，全国人民抗日意志对当局的影响，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进程，抗战初期四次大规模会战的因由等问题，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第二、关于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建国后抗战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发表的上10篇论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些文章论及的主要问题是：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和初期的作战方向问题。

(一) 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余子道认为，国民政府统帅部对日的基本战略是“持久消耗战略”。1935年春夏间蒋介石提出了这一战略的初步构想，1937年8月7日由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为抗日的基本战略方针，但至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时才最终形成。

“持久消耗战略”主要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等组成的”。持久战略的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即中国在长期抗战中将会丧失一批国土，但可用“空间”去换取持久作战的“时间”，以逐步耗散敌力，积蓄自己的力量。消耗战略的实施方针是“积小胜为大胜”，即由小的胜利积累而成大的胜利，由局部的胜利扩展而为全部的胜利。“持久战与消耗战是同一过程的战争发展趋向，持久说的是战争的时间，消耗说的是战争的内容”。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表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及其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通过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力量的过程，从战

① 《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

略退却转到战略反攻，去争取抗战的胜利”。按照这个总的作战方略，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期间进行了三个阶段的作战，但避免与敌进行战略决战，保持军队主力不被敌人消灭，同时迅速扩建和加强军事力量，并将抗战重心移向西南地区，继续坚持抗战，使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不能得逞。但是，这个战略方针也包含着错误的一面，这就是：持久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依赖外力取胜、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争形式。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倾向的日趋上升，错误一面在不断地发展着”。这些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造成了战争初期正面战场过快、过多和过大的损失，在相持阶段消极作战倾向逐步占了主导的地位，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败。^①

对于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方针，一些研究者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王树荫认为，从抗战开始到南京失守，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实质上是试图用阵地消耗、战役持久，来达到战略速决的目的”。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才调整部署，“开始实施持久战略，并在理论上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敌败我胜的战争结局作了论证”。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对奠定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格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它“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因而不能制定合乎中日战争特点的具体战略战术，而且在实战过程中，国民党往往背离持久作战的宗旨”。^②

王建朗指出，对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过去长期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以片面抗战的路线统括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并无一定之战略方针。另一种主要是台湾的一些史学家提出的，认为国民党当局早已洞察战争，抗战一开始就拟定了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以准确地

① 尔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② 王树荫：《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初探》，《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

反映历史的真面目。他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军事战略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战役，“持久战的思想已有所萌芽”，但是在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我们丝毫也看不出任何持久作战的战略思想，相反，却大有赌国运于一战的打算”。淞沪战役后，南京政府虽已被迫认识到“战事已转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但这“并不等于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了持久战方针，更不等于在具体战役战斗上能正确地运用持久战的战术”。京沪失陷后，国民党“逐步认识到了主动积极防御的重要性”。台儿庄战役“标志着国民党军事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战略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白崇禧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以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在武汉保卫战中，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斗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军队不仅有节节抵抗的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在达到消耗敌军争取时间的目的后，部队便主动撤出武汉，保存了继续抗战的实力。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战思想始终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只是指狭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战略”。^①

徐矛的看法是，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统帅部就有了“持久消耗战略”，但由于军队采用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术，使这一战略不能取得切实效果。^②

(二)正面战场初期的作战方向问题。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抗日战争史论著中反复强调，在八一三事变时，蒋介石即决策扩大淞沪战争的规模，主动地将作战重点由华北移到沪宁杭地区，引诱日军把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称此举的成功，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基础。余子道就此进行专题探讨，指出：

① 王建朗：《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② 徐矛：《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解放日报》1985年8月21日。

淞沪战役是逐步扩大的，到10月间才成为中日双方的主战场。中国之所以一再扩大战争的规模，是为了对付日军的逐步增兵。南京统帅部在战争之初并无开辟华东大战场的构想，更没有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指导动机。台湾的研究者也从未就他们的论点提供过确凿可信的史料，或披露一件档案材料。这就不能不使人存在疑问，所谓改变日军作战方向一说，是当时决定的战略方针呢，还是在总结战争时追加的一种概括？实际上，淞沪战役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将日军的主攻方向引到沪宁杭地区，但从全国战局看，它并未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南京统帅部开辟和扩大淞沪战场的真正原因，在于保护上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拱卫首都，争取国际干预以造成和平解决的契机。对这些战略意图中正确的及错误的方面，应当加以分析，而不应一味崇拜。^①王树荫认为，国民党将战略防御方向置于华东战场，“导致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日军从东、北两面合击中原”，使正面战场“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因此，开辟华东战场，“是战略防御方向的一大失策，得不偿失”。^②陈小功说：“日军进攻武汉，开始确有由北而南沿平汉线进攻的打算，但是，这只是由于华北广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牵制了华北方面军，同时，也是在国民党被迫引黄泛滥后才改变的，并非国民党有计划的战略指导的结果。^③

军事战略关乎战争全局的理论和实践，它对于分析正面战场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具体作战计划，各阶段之间的联系以及关键性战役的指挥等都至为重要。当前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重要问题仍须继续深入探讨，同时还要不断扩大研究范围，以全面认识正面战场战略决策及其实施的情况。

（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研究。过去由于对正面战场不重视

-
- ① 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 ② 王树荫：《评国民党开辟淞沪战场之得失》，《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
 - ③ 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55—56页。

或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对于其中的重要战役也极少研究。近10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史料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等书的出版，为正面战场重要战役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首次简要地介绍了15次重要战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印数达2万册。《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使用了大量档案材料，系统地叙述了各次战役的形势、部署及作战经过，内容充实，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现代史专著中，也用了较大篇幅叙述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为过去所未见。专题研究方面，10年来共发表了60多篇论文，分别对卢沟桥事变，淞沪、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豫湘桂战役，缅北滇西作战等进行论述。

这些对正面战场重要战役研究的论著，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1. 澄清事实，驳斥日本某些人推卸发动侵华战争罪责的谎言。卢沟桥事变是日军蓄意制造的挑衅性事件，目的是制造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对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已作出判决。^①日本的史学界也有公正的结论。^②但是，近几年来，日本有些人不断写书、写文章和回忆录，诬称是中国军队、“中共系统或激进抗日分子”打了第一枪，引起了卢沟桥事变这一偶发性事件，造成了八年的中日战争，企图推卸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责。许多研究卢沟桥事变的论著一致驳斥了这些日本人的谬论，指出此次事变并非偶发性事件，而是日军为执行本国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而阴谋策划的。曲家源对中日双方记录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后，论证道：“发动卢沟桥事变

① 张执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版，第332—333页。

②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版，第94—96页。

是日本侵略中国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占宛平是日军挑起事端的关键所在”。日方所谓“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一名士兵去向不明”等说法，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随意编造的谎言，“所施用的伎俩同日本多年来侵略中国、策动多起事变的手法如出一辙”。至于今井武夫所说的，“最初的射击……是中共系统或激进抗日分子挑起的”，只不过是这个当年日本的职业法西斯军人，为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狡辩而编造的奇谈怪论，表现了那些挑起中日战争的罪犯们的心虚胆怯。^①

2. 全面分析一些重要战役的得失。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对这些战役，研究者否定了过去一笔抹煞或概予轻视的简单化做法，而是从战争的全局出发，对敌我双方的战略计划、战役经过、结果及其他各方面的影响进行多层面的分析，对一些重要战役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如江抗美在评述武汉保卫战时，从当时战争的形势出发，说明这次战役是“一场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正义防御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扼要叙述作战的经过后，进而着重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分析了这次战役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及其原因，最后指出，敌强我弱是“武汉失守的基本原因”，但又和国民党在政治、军事、抗日外交政策的动摇等方面的主观错误分不开。^②这样就比较科学地评述了武汉保卫战的得失。即使是完全失败的战役，论者在研究其失败经过和原因的同时，也指出其积极的方面。如郭学旺等在评述中条山会战时，在研究敌我战前态势、作战经过、失败原因及中条山失守的严重后果之后，又说明会战中广大爱国官兵英勇苦战，削弱了侵华日军势力，支持了正面

① 曲家源：《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2期。

② 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战场作战，配合了敌后抗日斗争的意义。^①又如豫湘桂战役，论者在评述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时，对衡阳保卫战及洛阳、桂林保卫战等战斗予以肯定的评价，使人们看到在这次战役中，许多爱国官兵仍在浴血奋战，并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才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大溃退。^②还要指出的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正面战场曾发动一次“冬季反攻”，对此过去论著很少提及。何理和罗焕章等在他们的抗日战争史专著中，对这次“冬季反攻”作了专题叙述，并予以正确的评价。指出：这次反攻“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也是唯一的积极的带进攻性的行动，无可否认，它对打击敌人、坚持抗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仍然是战略上的‘速胜论’”，因此这次反攻“并未取得多少实际作战效果”。^③他们的论述填补了正面战场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3. 对淞沪会战的发起提出新见解。长期以来，对于这次会战是由中方发动的还是由日方发动的一直有争论。马振犊在《“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一文中写道：8月9日以前，日方还没有具备对上海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必要条件。而中国方面自一二八事变以后，就在淞沪地区进行抗日的准备与计划，造成了中方发动八一三战役的客观条件。“虹桥事件”中，“中方一改过去妥协退让方针，自始至终采取强硬立场，对日方的挑衅行为及无理要求予以坚决的回击”。同时在事件发生后“即决定了开战措施与大战计划”，“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上海战场”。8月13日上午，“中国军队在部分日军士兵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全面攻势，揭开了淞沪百日大战的序幕”。接着蒋介石派兵

① 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② 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三编第二十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赴沪增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并下达了“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的作战方针。可见，“‘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国民党军发动上海抗战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且早已做了必要的准备”。^①苏智良的《关于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几个问题》一文，和马振犊持相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保安总团士兵“打响了第一枪”，拉开了淞沪大战的帷幕，中国军队开辟了中日战争的南战场。^②

一场持久的抗日战争，是由许多重大战役及更多的大、小战斗组成的，这些战役和战斗的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目前正在开展的这方面研究工作，逐渐排除了“左”的干扰，已取得良好的成果。据统计，抗战中正面战场共有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③其中仍有不少空白点，需要继续进行全面的研究工作。

4. 关于正面战场战略阶段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起到1938年武汉失陷为止，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武汉失陷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对抗日战争何时进入相持阶段，以及正面战场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近年来研究者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划分问题。何理认为，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此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是相持阶段的前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几年，是抗战的第三阶段。可称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④刘庭华则将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划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

① 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8期。

② 见张琦：《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四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2期。

③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附表。

④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129、270、452页。

渡阶段”，1941年至1945年8月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① 隆武华的看法是，武汉失守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国民党仍把政策的重心放在日本身上，因此不同意把武汉失守当作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标志这一传统观点，而把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称为“过渡时期”，也就是战略防御的第二时期。1939年的湘北大捷至昆仑关对峙期间，由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日本的战略攻势停顿了，从总体上说，这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②

关于战略反攻阶段问题。刘庭华认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实施战略反攻”。^③ 有人指出，1945年春，国民政府曾决定于同年秋开始对日军发动进攻，然而，“未及部署就绪，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的‘大攻势计划’未及实施”。^④ 程乃胜提出，长期以来史学界依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抗日战争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但是，当1944年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时，正面战场正面临着第二次的大溃退，所以从全国战场看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反攻阶段。1945年8月中国军队全面反攻之前，日本政府已决定投降，并发出了投降通知。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而是在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在外部力量的支援下，急速转入胜利”。^⑤ 战略阶段划分问题和正确估计正面战场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5. 关于地方部队参战问题。以前对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的事实及作用很少研究，而比较注意揭露其中一些将领参与反共

① 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教学》1989年第7期。

② 隆武华：《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③ 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④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367页。

⑤ 程乃胜：《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磨擦、进行妥协活动的罪行。近年来这种情况有较大变化，一些地方正开展对地方部队参加抗战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和回忆录。关于川军的主要有：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合编的《川军抗战亲历记》、马宣伟等的《川军出川抗战纪事》两书，和《川军抗战史小辑》、邹吉川的《试析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军队》、王干国的《川军出川抗战述略》、吴铁国的《刘湘出川抗战诸因素的分析》等文。^①关于滇军的主要有：谢本书的《1937—1945年的云南与滇军抗战》、卢汉的《陆军第六十军参加徐州会战概况》、张曙东等的《云南抗战大事记略》等。^②关于晋军的有《阎锡山抗战记略》等。^③这些论著以大量的史实说明地方部队积极参加抗战的情况，他们几乎参与了正面战场所有的重要战役，在广阔的战场上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中地方部队参战的兵力约有百万人之多，一些战区就以他们为主力组成，是正面战场的主力军之一。研究地方部队的参战情况及贡献，是研究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从一个重要侧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同时还能说明国民党领导集团不顾大局，借机削弱地方势力，给抗战带来的危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起步，有待加强。

6. 关于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80年张晔著文，依据抗战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对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评价，认为“全面介绍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不仅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而且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全面地反映全国军民的抗战热忱，反映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四川档案史料》1985年第3期；《南充师院学报》（哲社）1985年第2期；四川大学历史系、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合编，《抗日战争史论丛》。

②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2期；《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③ 《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第3期，1983年7月。

的强大威力”。^①这一消除“左”的思想对正面战场研究的影响的意见，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其后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研究正面战场的评价问题。内容大致包括对正面战场在不同阶段的评价和总体评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等方面。

对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几位作者指出：“努力抗战与节节败退的交织并存是抗战初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抗日军事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的关键问题；因为它影响着我们对抗战初期（乃至整个抗战史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历史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历史评价。”^②通过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分析，大多数人认为：正面战场是这一阶段抗战的主战场，政府军队是抗日的主力，作战是积极的。经过这一阶段的战斗，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他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鼓舞了民心士气，促进了全国的团结进步，并支援了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争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严重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很差等原因所造成的。^③

对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地位，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有四种意见：（1）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虽然它的军队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

① 张晔：《怎样看待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新时期》1980年第3期。

② 谭继和等：《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与败退问题探索》，《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③ 参见袁旭等：《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高德华：《论抗日战争初期的国民党战场》，《齐鲁学刊》1985年第4期；丁卫等：《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吴汉城：《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浅析》，《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

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特征。^①这不仅明显地降低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妨碍和破坏抗战的作用。^②

(2) 分两段评价。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集团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还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掺半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几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待胜利，它的政权及军队更加腐败，大批将领投降，部队失去战斗力。虽然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失败。所以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的。^③

(3) 自七七事变至1940年，日军进攻的重点始终是正面战场。1938年11月至1940年，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大多数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给予较大打击。这时正面战场仍是抗战的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对华作战的重点对准敌后解放区，国民党对抗日已十分消极，正面战场在抗战中下降为次要地位。^④

(4) 有人对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是否一直是次要战场提出疑问，认为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进行过许多次大的战役，国民党军队是继续抗日的。因此，不宜笼统地说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就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⑤葛仁钧表示不同意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地位日益下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观点。他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

① 李巽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述评》，《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前引丁卫等文。

③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452—453页。

④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⑤ 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①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有所论述，近年来重新引起史学界的注意。目前提出的主要看法有四点：（1）两个战场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执行消极防御方针，进行正规战。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于是就出现了在“战场选择、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②这两个战场共同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2）两个战场的关系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又“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③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始终占着主导地位。两个战场的配合主要是在共同抗日中的战略配合，但也有战役和战斗的配合。虽然两者之间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但是，“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互为依存的关系一直贯穿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它所取得的最主要的成果是在政治上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致破裂，在军事上保证了抗日战争成为一场持久战”。^④（3）关于两个战场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所受日军压力必定成倍增加，困难自然大得多，但依靠人民群众，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敌后

① 葛仁钩：《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②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③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④ 阮家新：《试论中国战场和中国战区》，《党史通讯》1985年第9期；王廷科：《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史学会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前引徐焰文。

战场，正面战场就无法独力维持”。^① 1987年7月在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同志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研究历史只能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逻辑推论出发。两个战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为依存、互相制约，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单独依靠一个战场难以抗击日本的进攻，缺少哪一个战场都是不堪设想的。两个战场的作用都是不应低估的。^②

(4) 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是阶级利益对立的两种力量在与共同民族敌人作战时的一种特殊合作形式。它证明：阶级利益对立的政党和集团，在主要敌人一致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合作，而且合则两利；在反抗强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游击战和正规战互相配合，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同阶级利益对立的同盟者合作，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是重要的，但不能直接危害同盟者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党派和集团在共同参加民族战争时，作战的表现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将决定各自在国内的人心向背。^③

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的一些历史著作忽视或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说什么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决不会发生改变”。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批评了这类论调，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指出：任何轻视中国抗日战争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④ 宦乡写道：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的国策不仅仅要灭亡中国，它最终谋取的是征服世界。中国的抗日

①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② 前引吴明文。

③ 前引徐焰文。

④ 参见：齐世荣：《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傅尚文：《试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宋时轮：《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军报》1985年8月5日；李巨廉：《中国人民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面光辉旗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前引何理书，吴明、阮家新文。

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次爱国自卫战争，对全世界来说，是武装反击法西斯侵略的第一炮。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仅次于欧洲的另一个主要战场。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先突破中间，后打两头”的军事战略计划，是阻止日军北进的主要因素，从而使苏联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中国的抗战牵制、消耗和歼灭了大量日军，推迟了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这就支援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力地支援了亚洲太平洋战场。在抗击日本的战争中，中国打了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打了14年），美国打了不到4年，苏联则只打了20多天（实际作战只有10余天）。中国歼灭日军的数字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伤总数的8倍，是苏军击毙日军总数的31倍。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伤亡约2千万人，财产损失无法计算的牺牲取得了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为最终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①

对正面战场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争论集中于相持阶段，而这正是评价正面战场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的涉及面较广，必须对具体战役战斗作深入探讨，又要作全面考察以求得实事求是的结论。正面战场的研究，将直接影响到对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认识，必须认真对待。

三

从以上简要的综述中可以看到，近10年来，正面战场研究已经突破禁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所束缚，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往往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立起来，这种阴影现在仍

① 富乡：《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世界历史》1985年第8期。

然能够看到。实际上，两个战场抗战的目标都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广大爱国官兵和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为保卫祖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正面战场是中华民族抗日的重要战场。只有将两个战场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把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使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地位得到应有评价。

(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双方综合实力的强弱。战争的军需保障依赖于经济力量。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又和人民的精神力量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些方面来宏观地考察正面战场，才能深入分析其进退得失的根本原因，认识它的全貌。

(三) 拓宽研究领域，除前述几个重要问题之外，还应开展多方面的探索，如军事组织和指挥系统的变更、兵役制度、后勤工作、爱国官兵和著名将领的抗战事迹、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重要战斗、空军和海军作战情况等等，并要促进研究的深化，使抗战史的内容更丰满、充实。

(四) 有关正面战场资料的编辑、出版和利用亟待加强。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目前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还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到档案馆查阅资料限制甚多。二是对已有的资料利用率还不高。这些都应尽快得到改进，使研究成果建立在更扎实的资料基础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能给人们以更多的启迪。

(注：此文述评范围为1978年—1988年，原载《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一书，该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